

# 当代上海城市街道空间管控实践中的观念与方法

## Concepts and Methods in the Practice of Street Space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City

周鸣浩 王笑 伍江 ZHOU Minghao, WANG Xiao, WU Jiang

**摘要** 聚焦当代上海城市街道空间管控实践,梳理其发展演进历程,并基于空间治理的视角,以管控观念与方法的变迁为线索,从目标、对象、机制和路径4个层面,对其展开深入解析。由此提出,自1990年代以来,在上海街道空间管控的发展过程中,管控对象经历从要素到空间的迭代,管控机制发生从碎片化到整体化的转变;同时,有序与活力这一对管控目标在不同阶段交替出现,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型治理这两种管控路径在实践探索中互为补充,共同推动街道空间品质螺旋上升,治理效能不断提高。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urban street spac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sorts out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a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overnance, takes the changes in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ethods as a clue,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from four levels: goals, objects, mechanisms, and paths. Therefore, since the 1990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reet space control in Shanghai, the control objects have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elements to space, and the control mechanism has changed from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ol objectives of order and vitality alternate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two control paths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and conventional governance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practical exploration, jointly promoting the spiral improvement of street space qualit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patial governance.

**关键词** 街道空间;街道要素;管控主体;管控观念;管控方法

**Key words** street space; street elements; control subjects; control concept; control methods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4) 03-0060-05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40309

### 作者简介

#### 周鸣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

同济大学文科办公室 副主任

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 执行副院长

《亚洲建筑》编辑部 运营主编

#### 王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 伍江(通信作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 院长

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任, wujiang@tongji.edu.cn

## 1 研究背景

街道空间管控发轫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对街道过度机动化问题的反思,是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革命以来对机动车交通的过度强调,给城市带来街道噪音、环境污染、街区活力下降等问题<sup>[1]</sup>。各类问题的不断积累加之人车矛盾的日益尖锐,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街道与人<sup>[2]</sup>、街道与城市的关系<sup>[3]</sup>,最终在全社会形成推动街道从“车本位”向“人本位”转型的共识<sup>[4]</sup>。在人本街道理念的指导下,学界提出多种街道设计方法<sup>[5]</sup>,并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街道空间管控实践,影响较大的有“共享街道”<sup>[6]</sup>、“绿色街道”<sup>[7]</sup>和“完整街道”<sup>[8]</sup>等。从全球各大城市的发展经验来

看,这些街道空间管控工作对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整体来看,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我国的街道空间管控工作起步较晚,在21世纪以来各类城市品牌的创建中,仅有部分内容涉及街道空间管控工作。但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建设和管理领域的佼佼者,城市化进程快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因此早在1990年代就对街道空间管控工作进行了初步探索,不断开拓创新,大大改善了上海的街道空间和城市面貌。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上海街道空间管控实践的研究,把握其管控观念与方法的转变,从而为上海今后的街道空间管控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 2 研究对象

### 2.1 街道空间管控

本文研究的“街道空间管控”，是指在城市的日常运行管理中，有关政府管理部门通过对街道空间中的物质要素和行为要素进行引导、规范、管理和整治，以达到优化街道功能、规范空间秩序、美化街道景观、提升街道空间品质的目的。

物质要素是实施街道空间管控的重要抓手，其内容包括道路底界面和道路侧界面，以及附着在两者上的绿化植被、市政设施、城市家具、店招店牌和沿街立面附加物等。行为要素是指一些必须进行管控，否则会对街道空间品质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行为，如某些首层业主破墙开店、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非机动车在人行区域随意停放等。

在实际的城市管理过程中，街道空间管控工作的综合性较强，管控主体较为多元（见图1）。政府管理条块来看，在“块”上，分市、区、街道办3级，相关管理部门从不同层面对街道空间开展管控实践。市级主要通过政策和标准来把握和调节街道管控的方向与重点，区级根据各区实际情况，通过规划或计划确定阶段性的街道空间管控工作的要求和重点，街道办则负责落实具体工作。同时，3级管理部门都会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力量编制设计或管理导则来加强专业性指导。从“条”来看，涉及街道要素管理的部门众多：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需要对街道空间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绿容局负责绿化、店招店牌和景观灯光等要素；交通委管辖道路底界面、公交站台、交通标志牌、信号灯等要素；道路沿线的建筑立面及附着物由房管局和规资局管理；电话亭、变压器等市政设施也由不同部门管辖；生命线系统的管理主体更加复杂，特别是通信管线，不仅涉及电信部门，还与多家国企单位相关。

### 2.2 研究对象和视角

当代上海的街道空间管控实践，是指自1990年代以来，在上海城区范围内，各级政府

对街道空间及其相关要素进行的整治、规范、管理和引导行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可分为重大活动环境保护、风貌街道保护规划和街道空间品质系统性提升3种类型；从时序和比例上来看，重大活动保障工作开展得最早，但其比例近年来逐渐降低；风貌街道保护规划最开始是作为“迎世博600天行动”的组成部分，在活动结束后，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风貌街道空间管控体系；街道空间品质系统性提升工作是近10年开展的，随着《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的出台、“美丽街区”的建设，此类工作现已成为街道空间管控工作的主流（见图2）。关于街道管控既往相关研究多是针对

具体管控项目，提出相应的设计优化策略<sup>[9-12]</sup>。

在研究对象方面，笔者不局限于单一的街道空间管控实践，而是将1990年代以来上海市不断演进的街道空间管控实践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总结上海市街道空间管控工作的特点、类型和变化趋势。在研究视角方面，基于治理视角，以街道空间管控的观念与方法为线索，从街道空间管控的对象、机制、目标和路径这4个维度，探究管控主体与街道空间的互动关系。

## 3 街道空间管控的观念与方法

街道空间管控观念，是指管控主体对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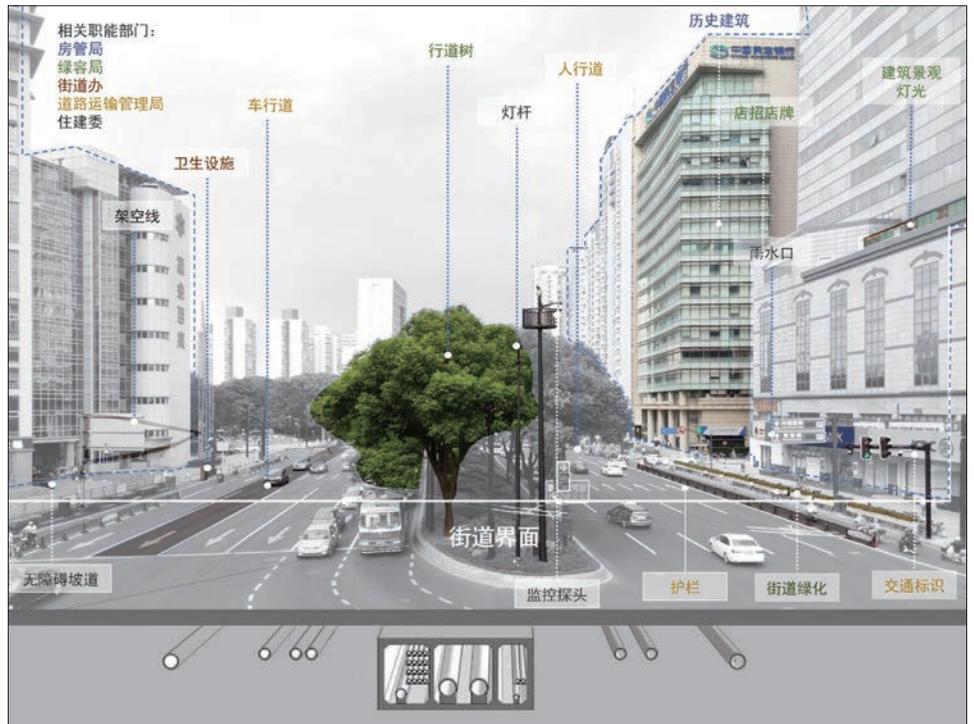


图1 街道要素与相关管控部门示例  
Fig.1 Example of street elements and related control departments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



图2 上海街道空间管控大事记  
Fig.2 Chronicle of Shanghai street space management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

道的认识,包括其对街道的定义和对街道的价值判断两个方面。管控对象便是管控主体对街道的定义,它反映了在政府的视野中,街道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或要素;管控目标是管控主体对街道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样的街道是好的街道。街道空间管控方法,是指管控主体为实现街道空间管控目标,所采用的方式、路径和程序,即进行街道管控的相关机制和治理路径。通过对当代上海街道空间管控的对象、目标、机制和路径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能够了解管控观念与方法发生的变化及其深层动因,并为今后的街道空间品质提升工作提供参考。

### 3.1 有序与活力的管控目标螺旋上升

谈及街道,浮现在脑海中的画面,可能是摊贩云集、人流如织,食物香气扑面而来,街道中满溢活力,抑或是街面整洁、纤尘不染,各类街道设施井井有条,三两行人不时经过,处处整洁有序。多数人体验过这两种街道场景,而这两种场景却往往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街道是城市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大多数社会交往发生于此。街道也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较易产生冲突的场所,例如临街的居民出于扩大居住空间、改善生活环境、增加营业面积、提高营业收入等目的,在街道上私搭乱建的行为,无疑是侵害了公共利益,妨碍了行人的路权。又如在街道上摆地摊、售卖蔬菜水果、日用百货等马路菜场和马路集市的存在,一方面方便了生活,降低了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造成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降低生活品质。

利益关系交织博弈的不同结果塑造出各式各样的街道面貌。若对这些街道面貌进行分类排序,在理想的情况下,有序与活力应分别是直角坐标系的X轴和Y轴。但是受到管理水平、物质条件、群体需求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有序与活力更像是线段的两端,两者难以兼得(见图3)。

对上海而言,改革开放前20年的街道空间管控宽松,充满活力;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治理机制的完善,上海尝试在

街道空间管控中兼顾有序与活力。

1980年代的上海面临着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的多重压力,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各项生活配套设施不到位,再加之监管水平不高等因素,使得马路菜场、集市在街道中野蛮生长。19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为帮助国企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上海市推出“4050”工程,其中一项内容是在街道步行空间中设置书报亭、彩票亭等<sup>[13]</sup>。无论是群众自发形成的马路菜场,还是政府统一设置的各类亭棚,在客观上都丰富了街道业态,激发了街道活力,但同时也造成占用街道、妨碍通行等弊端,甚至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

21世纪以来,上海明确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定位,对市容市貌和街道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随着街道管控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城市管理执法体系的建立,对各种侵占街道的街道要素进行整顿。但由于这些马路菜场、各类亭棚解决了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承担了一些居住区的商业功能,因此在整治中并不是一禁了之,而是通过推动马路菜场入场入市、占道亭棚入街入店,给摊贩提供出路,完善社区配套,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经过多年努力,占道经营、亭棚阻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环卫清扫、箱杆减量等工作也取得长足进步,最终形成如今整洁有序的街道面貌。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国务院号召各地放开地摊经济,社会公众对路边摊所代表的“人间烟火气”也有一定的怀旧心理,而随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在街道空间管控中兼顾有序与活力便有了可能。2022年9月22日,《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允许部分区域设摊经营。

### 3.2 管控对象从要素到空间的更迭

街道空间管控目标经历了从活力到有序再到活力的转换,与之相应,管控对象也经历了从要素到空间的更迭。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成为国家战略,上海获得巨大的发展机

遇,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街道空间中设置各类亭棚,引入各种箱、杆等功能要素,甚至出现乱搭私建等现象,进而导致私人侵占街道空间的“公地悲剧”。

街道管控对象从要素到空间的更迭,经历了从自发清理要素到自觉提升空间的两个阶段。

#### (1) 自发管控阶段(1990—2010年)

在这一时期,管控主体下定决心清理街道要素,以保障街道空间的正常使用。从对各类违规要素的取缔开始,比如治理以马路菜场为代表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上海自1990年代开始,通过投入资金建设室内菜场、推动马路菜场入室等方式,对马路菜场进行整顿。到1998年底,共清退占路面积89万m<sup>2</sup>,基本解决了占道经营问题。随后,管控重点转向了对街道中违规物质要素的整治,集中精力拆除街道中的各类违建、清理堆放在街道中的各种杂物。经过多次重点整顿,街道中的私搭乱建情况大为好转。

对违规要素的清理基本完成后,清理重点又转向了部分“落后”要素,如户外广告牌。上海的广告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再次发展起来,在几十年的蓬勃生长中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自21世纪以来,大型广告牌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并逐渐显现出存在安全风险、影响市容形象等弊端。因此,在APEC会议环境保障和“迎世博600天行动”中,屋顶广告、高炮广告等大型广告牌是重点管控对象。2001年,上海针对户外广告牌出台专项法规;在“迎世博600天行动”期间,共清理了4.7万块户外广告牌,基本做到市政设施内无商业广告。

自发阶段的管控活动尚未有明确的空间管控意识,但是其各种举措在客观上对街道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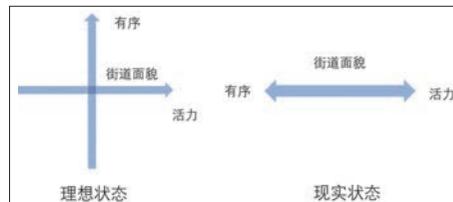


图3 街道空间管控目标的理想与现实

Fig.3 Ideal and reality of street space control objectiv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间秩序的建立有着一定的提升作用,如对马路菜场、违建等要素的清理将街道步行空间从各类要素中解放出来;对户外广告牌等要素的规范管理则净化了视觉空间。

### (2) 自觉管控阶段(2010年至今)

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各种举措提高街道空间品质。例如改善街道空间生态环境,丰富街道景观的林荫道建设。2011年,上海市绿化部门将林荫道建设列为“十二五”“十三五”的重点工作内容,通过编制建设导则,修订养护标准,开展示范道建设等举措,形成了一整套规划、创建、评定和养护的标准化流程。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林荫道317条,总长近300 km。又如梳理街道慢行空间,塑造多层次街道休闲场景的绿道建设。自2017年以来,以每年200 km的增量推进,在2035年建成2 000 km的骨干绿道。此外,还有为畅通街道人行空间,梳理街道天际线进行的亭棚整治、多杆合一、架空线入地等管控工作。

### 3.3 管控机制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逐步完善

针对条块体制所导致的碎片化管理等问题,1990年代中后期学界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sup>[14]</sup>。该理论旨在对政府和社会以及政府内部的层级和功能进行整合,以实现跨部门、跨边界的治理目标。上海街道空间管控机制的变革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机构改革、信息建设和社会参与这3个层面。

在机构改革方面,强调整合功能相近的机构,并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城管执法便是上海街道空间管控中进行功能整合的机构<sup>[15]</sup>。城管执法涉及市政、绿容、工商、公安等多个职能部门,但传统的条块管理方式带来了执法力量分散、权责不清晰等问题。经过前期的摸索试点,上海市从1997年起开始在街道层面推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对辖区内违反市容、绿化、环保等相关法规的行为进行综合执法,对解决马路菜场、拆除违建等街道空间管控行动起到很大作用。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创建,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

的协同联合工作。市政市容联席会议一般由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担任召集人,住建、市容、城管等各条块的部门副职主管共同参与,协商解决街道治理中的难题。通过这个平台,各部门实现了业务流程再造,扩大了街道管控范围,是以空间作为管控对象的制度基础。

在信息建设方面,运用信息、网络等技术手段打破条块分隔。在街道空间管控中,上海通过网格化建设将街道要素纳入统一的数据库中,并以此为中枢,将居民意见反馈到政府各职能部门,以技术手段倒逼条块改革<sup>[16]</sup>。依托信息系统,在街道空间管控中实现了精确定位管理对象,并建立“发现—立案—派发—处理—核查—结案”的完整流程,有效提高了管控质量。在某种意义上,2019年以来的“一网统管”是在更大范围、更广维度、更高层次对网格化管理理念和实践的迭代升级。

在社会参与方面,强调引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业主等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如徐汇区在对店招店牌的管控中,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使设计师、店主、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都参与到店招店牌的管控中来,通过充分沟通,以导则的形式落实各方意见,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目的。

通过碎片化管理向整体性治理的转型,上海的街道空间管控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体制机制方面,统筹多部门多力量,保障街道空间品质提升的改革创新仍不充分;在信息建设方面,网格化使得街道要素的日常维护步入了信息化时代,但却未能以此为契机实现街道空间品质提升的数据互通<sup>[17]</sup>;在社会参与方面,仍欠缺成熟的常态化机制。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在未来的街道管控实践中去进一步探索 and 解决。

### 3.4 实行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型治理互补互鉴的管控路径

运动式治理是指“治理主体运用自身资源,打破常规程序,对社会重大问题或难题进行的运动式专项整治的方式”<sup>[18]</sup>。常规性治理是运动式治理的反面,是指通过分工明确、组织有

序的常规结构,针对社会事务提供制度之治。

在街道空间管控中,运动式治理是一个常用的手段,运用在“创文”“创卫”等重大城市事件。但部分学者认为这类整治运动逃不出“乱象—治理—再乱象”的循环<sup>[19]</sup>;同时一些运动式治理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等原因,采取一刀切,甚至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给群众生活带来负面影响<sup>[20]</sup>。

笔者认为,运动式治理的合理性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有效性,运动式治理能够在短期内缓解突出矛盾,如在街道空间管控中通过高强度的投入迅速改善街道面貌;二是实验性,在运动式治理的过程中,一些超常规举措的使用往往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如上海市的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在“迎世博600天行动”中发挥了良好作用,并在行动结束后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快速发展是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这两条管控路径实现互补互鉴的根本原因。在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共享单车等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常规治理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其对街道的管控就会逐渐变得低效甚至失效。当新的矛盾产生并积累到临界点时,管控主体往往会采取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去缓解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创新举措,会为后续高效常规治理的形成提供参考。

在街道空间管控过程中,林荫道建设、绿道建设,以及美丽街区建设都存在着两种管控路径的互动。林荫道建设开始时间较早,有较长的时间实现运动式治理向常规治理的转换。林荫道建设的开始也是选择了运动式治理的方式,集中资源打造了几条示范性道路,但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很快就将其向常规治理的方式转换:制定《上海林荫道建设导则》,规范了创建工作;修订《行道树养护规程》,确定了养护标准。在上述经验的基础上,2016年发布《林荫道设计规程》,实现了林荫道从规划、建设、评定、养护全流程的制度化 and 标准化。

## 4 结语

近30年来,上海的街道空间管控工作成

果斐然,并在管控目标、对象、机制和路径这4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最终形成以“美丽街区”建设为代表,对街道空间品质进行系统性提升的管控实践。但在对当代上海街道空间管控观念与方法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当前管控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公众参与不足。上海的街道空间管控塑造出整洁有序的道路面貌,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规范长于制造“有序”的道路空间,但很难涌现出街道的活力。自下而上的街道空间管控模式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给予个人和团体改造周边街道空间的权利。在不影响公共使用的情况下,个人向相关部门备案后,可以对周边街道空间进行小尺度改造,以适应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明确后续的养护与管理责任。对于个性化改造的道路空间,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定期检查使用情况,确保其对于社会公众有着正面反馈。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通过创新管控模式,以自下而上的街道空间管控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发挥群众智慧,是街道空间管控走向精细化治理的必由之路,这也是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理念的具体阐述。

(感谢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原副局长鲁建平和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金山接受访谈,并为本文提供相关研究资料。)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彭钢. 城市街道活力的营造[D]. 长沙: 湖南大学, 2006.  
PENG Gang. Creating the vitality of urban street [D].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2006.
- [2] 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 JIN Hengshan,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1.
- [3] 迈克尔·索斯沃斯, 伊万·本-约瑟夫. 街道与城镇的形成[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SOUTHWORTH M, BEN-JOSEPH I. Streets and the shaping of towns and citie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6.
- [4] 许传忠, 刘杨, 李志. 由“车本位”到“人本位”——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探析[J]. 规划师, 2003, 19(9): 80-81.  
XU Chuanzhong, LIU Yang, LI Zhi. From "vehicle-oriented" to "man-oriented" -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traffic[J]. Planners, 2003, 19(9): 80-81.
- [5] 卢柯, 潘海啸. 城市步行交通的发展——英国、德国和美国城市步行环境的改善措施[J]. 国外城市规划, 2001(6): 39-43.  
LU Ke, PAN Haixiao. Evolution of pedestrian environment in urban area: reviews of the pedestrian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actice in UK, Germany and USA[J]. Urban Planning Overseas, 2001(6): 39-43.
- [6] DUDEK J. Design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a vital woonerf street[C]//19th SGEM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Scientific GeoConference EXPO Proceedings, 2019.
- [7] 张善峰, 王剑云. 绿色街道——道路雨水管理的景观学方法[J]. 中国园林, 2012, 28(1): 6.  
ZHANG Shanfeng, WANG Jianyun. Green streets-landscape design approach to road rainwater management[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2, 28(1): 6.
- [8] 陈肇, 刘翠鹏. 从汽车导向到完整街道: 美国完整街道概述[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3): 140-144.  
CHEN Zhi, LIU Cuipeng. Complete stree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3): 140-144.
- [9] 沙永杰, 伍江. 上海市徐汇区历史街道保护规划探索[J]. 时代建筑, 2013(3): 34-39.  
SHA Yongjie, WU Jiang. An exploratory planning mode associated with action agenda for historical streets in Shanghai Xuhui District[J]. Time Architecture, 2013(3): 34-39.
- [10] 王林, 薛鸣华. 基于精细化治理的街道城市设计以上海徐汇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J]. 时代建筑, 2021(1): 56-61.  
WANG Lin, XUE Minghua. Urban street design based on delicacy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Xuhui Hengshan Road-Fuxing Roa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ea in Shanghai[J]. Time Architecture, 2021(1): 56-61.
- [11] 葛岩, 祁艳, 唐雯, 等. 街道复兴: 需求导向的街道设计导则编制实践与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2): 90-98.  
GE Yan, QI Yan, TANG Wen, et al. Street renaissance: 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need-based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2): 90-98.
- [12] 王丹宁, 钱成裕, 吴小兰. 再看街心花园与美丽街区——上海街区景观更新发展研究与实践[J]. 中国园林, 2021, 37(z2): 46-49.  
WANG Danning, QIAN Chengyu, WU Xiaolan. From street garden to beautiful block - study and practice of block landscape renewal development in Shanghai[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 37(z2): 46-49.
- [13] 宸星. 让百万下岗职工走上就业路——上海4050工程大扫描[J]. 今日上海, 2002(11): 8-12.  
CHEN Xing. Let millions of laid-off workers embark on the path of employment - Shanghai 4050 Project big scan[J]. Shanghai Today, 2002(11): 8-12.
- [14] 张金钱. 整体性治理研究[D]. 沈阳: 东北大学, 2011.  
ZHANG Jinqian. Research on holistic governance[D]. Shenyang: Northeast University, 2011.
- [15] 陶振. 大都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体制变迁与治理逻辑——以上海为例[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7, 18(1): 34-43.  
TAO Zh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overnance logic of urban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 - the case of Shanghai[J].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7, 18(1): 34-43.
- [16] 刘中起, 郑晓茹, 郑兴有, 等. 网格化协同治理: 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7, 18(2): 60-68.  
LIU Zhongqi, ZHENG Xiaoru, ZHENG Xingyou, et al. Gridd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hanghai practice of fine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norm[J]. The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7, 18(2): 60-68.
- [17] 陈海松, 应敏. 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 “网格化”与“大联动”——以上海为例[J]. 上海城市管理, 2014(4): 64-69.  
CHEN Haisong, YING Min.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urban management: grid and big linkage[J].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4(4): 64-69.
- [18] 冯志峰. 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07, 9(2): 4.  
FENG Zhifeng. China movement father of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J]. Journal of the Yinchuan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 2007, 9(2): 4.
- [19] 安永军. 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纵向协同机制[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2): 120-128.  
AN Yongjun. The vertic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conventional governance and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J]. Social Science of Beijing, 2022(2): 120-128.
- [20] 刘长生, 裴越. 运动式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16(27): 70-72.  
LIU Changsheng, PEI Yue. Exploring the social effects of sports governance[J]. China Collective Economy, 2016(27): 70-72.